

徐 乘 著

杂文学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I056

34

✓

杂 文 学

徐 乘 著

B276/11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1年2月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杂 文 学

徐 乘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南京市中山北路305号)
邮政编码 100866 邮政编码 210003

开本 850×1168mm 1/32 1991年2月第一版
印张 7.5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8千字 印数 1—3000册

书号 ISBN 7—5043—0917—6/I·93 定价 3.80元

序

张明儒

我是徐乘同志杂文的老读者。一九六四年五月三十日，《解放军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余可的杂文，题目叫做《“火车头”和“老黄牛”》。这篇文章，思想敏锐，说理透彻，文笔流畅，生动地勾勒了大庆人的英雄形象，堪称上乘佳作，引起了我这个杂文爱好者的重视。我在工作中曾用文中所讲的革命者应当具备的“火车头”和“老黄牛”精神激励指战员。时隔二十多年，纯粹是一个偶然机会，我购买了一本出版不久的《杂文百家专访》，阅读时发现“余可”即徐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学系副教授，便与他建立通讯联系，请他帮我找一些杂文创作方面的著作。今年五月，他因指导学员毕业实习和招收新生，来到边城乌鲁木齐，我们才见了面。承蒙他没有忘记，给我带来了一本《杂文创作百家谈》和他的几万字的教学大纲《杂文写作》。我俩一见如故，交谈多次，谈的多是新疆民情风俗和杂坛上的事情。

这本《杂文写作》，其实就是《杂文学》的雏形。他当时告诉我：“不好意思，三十年创作实践，六年理论探索，熬出来的竟是这么一点小小的货色，十分惭愧。”我告诉他：“时代需要杂文。杂文的发展提高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杂文作者的努力。据我了解，现在把主要精力放在杂文理论研究上的人不多，开设《杂文写作》课程的学校更是寥寥无几。你现在从事杂文理论研

究和杂文教学,是一项开拓型的事业。你的研究成果,将对杂文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也许会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我祝你在杂文创作和理论研究中作出更大的成绩。”我并非虚美,我觉得他研究杂文理论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五十年代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有文学根底,对杂文这一文体特征及其源流演变当然熟谙;他毕业后在部队报社当过十多年副刊编辑,主编杂文,自然知道新闻园地对杂文的诸多要求;他自己便是一位杂文作者,有创作实践,尝到过甘苦,决不会写“门外文谈”之类东西,必然努力地把自己的创作经验上升为切实管用的理论。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杂文学》这本书,最初作为系列论文在《新闻知识》月刊连载以后,曾被广大读者和行家评为“优秀作品表扬奖”。

徐乘同志对杂文理论的研究是有广度的。他的《杂文学》全书共分成九编,首编“文体涵义”,就奇兵突起,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杂文概念,并且从多方面探索这一文体的特征。第二编“社会功能”,对这个争论了数十年的问题,大胆地亮出了自己的看法。第三编“源流演变”,介绍这一文体发展过程,让大家知道它的来龙去脉。第四编“谋篇布局”,是初学写作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作者从标题、开头一直谈到杂文的结尾。第五编“立意创意”,所谈者是文章的主心骨,犹如军中之帅,这是最为要紧的。第六编“艺术特色”,作者从形象、抒情、叙事、理趣、联想、气势、幽默、修辞等等方面,探讨这一文体的特点,着墨最多,花的力气也最大。第七编“兼收并蓄”,广泛研究文言杂文、广播杂谈、外国Essay的写作技巧,阐述杂文与新闻的关系,以及杂文与相声、漫画、寓言的杂交,目的在使当代杂文兼收并蓄各种营养,以利于自身发展。第八编“作者素养”,提醒初学写作者不要局限于文字皮毛,要从生活、知识等方面增强素养,并且谈到了作者自身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此外,尚有第九编

“作品附录”，作者从内容到形式，作多方面考虑，在自己数百篇作品中精选了二十篇，附在专著后面，用以印证自己的观点。在我见到的杂文理论著作中，能够如此全方位多侧面探讨问题的似乎不多，所以我说此书洋洋大观，决非溢美之辞。

徐乘同志对杂文理论的研究是有深度的。此书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不是封闭式的经院作品，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冥思苦想，从概念到概念，作纯粹的抽象判断；它不是东抄西凑的货色，循着“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公式，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改头换面，然后打上自己的标记再推销出去；它不是水上浮萍，今天刮东风，便往东边飘，明天刮西风，就向西边靠；它不学蜻蜓点水，仅仅停留于表面，而是深入肌肤，对杂文本质特征及写作规律作了层层剖析。总之，它是作者学习古今中外杂家创作经验的结晶，作者自身创作实践的升华，敢于对杂坛争论不休的焦点提出自己看法的理论著作。因为它是作者三十年心血熬制成功的，所以它有特色，有血有肉有骨骼，内容饱满，能够脚踏实地站稳脚跟。

这部著作，反映了徐乘副教授的研究成果。他的理论研究，没有因为此书的出版而停顿下来，他还要在杂文理论的海洋中游泳，还要探索新的问题。他对已经写成的有些章节并不满意，例如谈到“五四”至建国前的杂文，仅对“鲁迅式杂文”有所论述，而对其它杂文几乎没有提到。我祝愿徐乘同志今后在杂文创作、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自认是徐乘同志著作的读者，是亲密的文友。他邀我作序，我感到意外和惶恐，经不起他热情真挚的邀请，我只好勉为其难。

我不知道这篇东西能不能算是“序”？

目 录

第一编 文体涵义	(1)
第一章 杂文的概念.....	(1)
第二章 刘勰心目中的杂文.....	(6)
附录 《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译注.....	(10)
第三章 杂文与新闻评论的区别.....	(23)
第四章 杂文的类型.....	(28)
第二编 社会功能	(33)
第五章 杂文的三大功能.....	(33)
第三编 源流演变	(40)
第六章 杂文的历史演变.....	(40)
第四编 谋篇布局	(48)
第七章 标题.....	(48)
第八章 开头.....	(53)
第九章 展开.....	(58)
第十章 结尾.....	(63)
第五编 立意创意	(67)
第十一章 意——杂文的主心骨.....	(67)

第十二章	脱弃陈骸求新异	(73)
第十三章	歌颂性杂文的勃兴	(80)
第六编	艺术特色	(84)
第十四章	形象化的手段	(84)
第十五章	叙事手法	(88)
第十六章	抒情方式	(94)
第十七章	语言特色	(98)
第十八章	理趣	(103)
第十九章	幽默讽刺在杂文中的运用	(109)
第二十章	联想——沟通理象的彩桥	(114)
第二十一章	气势	(121)
第二十二章	杂文与修辞	(127)
第七编	兼收并蓄	(140)
第二十三章	文言杂文的写作技巧	(140)
第二十四章	广播杂谈的特点	(145)
第二十五章	杂文与 Essay	(48)
第二十六章	杂文的杂交	(159)
第二十七章	杂文的新闻性	(164)
第八编	作者素养	(168)
第二十八章	杂文作者的素养	(168)
第二十九章	对真善美的执著追求	(175)
第九编	作品附录	(181)
①	“火车头”和“老黄牛”	(181)
②	想起了延安窑洞	(183)

③秦淮河畔话漓江·····	(185)
④心中有玉·····	(186)
⑤一卒之志可嘉·····	(188)
⑥浮圆子·元宵·汤圆·····	(190)
⑦给我一只布袋子·····	(191)
⑧肖规曹随 遵而有失·····	(193)
⑨走向与面向·····	(195)
⑩不妨引进几只“垃圾箱”·····	(197)
⑪天王府里悼天王·····	(199)
⑫字字珠玑·····	(201)
⑬报林丑蝙蝠·····	(203)
⑭话须通俗方传远·····	(206)
⑮金城之宝不在金·····	(209)
⑯车过倒淌河·····	(211)
⑰千金难买心里富·····	(214)
⑱戈壁三题·····	(215)
⑲与克里空的对话·····	(216)
⑳最怕张怀庆·····	(219)

第一编 文体涵义

第一章 杂文的概念

一切事物都先有实体，后有名称，杂文亦然。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某些篇章，已初具杂文雏形和特征，但那时并无“杂文”这个名称。过了将近一千年，南朝刘勰才首先提到“杂文”。

他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把三种文章归入杂文：一是“以申其(指作者)志”的对问体，由宋玉首创，此类文章常“托古慰志”，“杂以谐谑”；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七体”，由枚乘首倡，此类作品往往假托人物、事件表达作者心意，“腴辞云构”，“始邪末正”；三是扬雄发肇的连珠体，常用整齐的排偶句列举事例，比喻论证，“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刘勰还在篇末着重指出：汉朝以来杂文“名号多品”，文体繁杂，所以只能“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

《文心雕龙》对杂文的范围、特点、性质作了一些解释，虽然并不完善，与今人所说杂文概念也并不完全一致，如枚乘首倡的《七发》，是难以“归杂文之区”的，但确有创见，有可取之处，即：杂文必须有人、有事、有物，说义理，抒感情，托物讽谕，杂以谐谑，富有文采，而且它应该是“文小易周，思闲可赡”的精工小品。

宋初李昉等人编辑文学总集《文苑英华》共1000卷，其中29

卷（351至379卷）用以辑集杂文。它把杂文分为问答、骚、帝道、明道（附杂说）、辩论、赠送、箴戒、谏刺（附杂说）、纪述、讽谕、论事、杂制作、征伐、识行、纪事共十五类。这样的分类虽然繁琐了一点，而且把文章内容和形式混为一谈也欠妥善，但再次肯定了杂文的文学地位和“名号多品”，并且辑集了几百篇范文供后人阅读欣赏，很有资料价值。

到了明代，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对杂文涵义作了明确的解释：“然称名虽杂，而其本乎义理，发乎性情，则自有致一之道。”他讲得比较简单，但有值得注意之处：杂文要有感而发，以义理为根本，做到情理交融，寓理于情。

历代谈论杂文的人不多，但从他们的片言只语以及列举的作家、作品来看，都认为杂文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可用以抒情、叙事、说理，但偏重说理，常用讽谕、诙谐的笔法。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作者都把杂文归入散文大类，因为它与散文一样，有别于注重节奏、音韵的诗歌，有别于着意刻划人物形象的小说，有别于讲究舞台艺术的戏剧。但杂文与散文毕竟还有本同末异之处，它具有特殊性，即偏重议论说理。它又与一般议论文不同。一般议论文抽象说理，比较冷静、严肃、枯燥，杂文则有鲜明的文艺性。它虽不象小说那样细致描绘人物，但要粗线条地勾勒，寓理于形象之中。它虽不象诗歌那样热情洋溢，但也须作必要的抒情，寓理于情，增强感染力。它比一般议论文更富文采，色彩缤纷，艳丽夺目；议论时往往不直接说理，而是通过形象、抒情、记叙等方法，让读者间接地体会到作者的观点。象这样一种独特的文体，理应从古代散文中分离出来，可惜过去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

“五四”以后，鲁迅开拓了一条新的创作道路，由于他的努力，杂文顿增光辉，逐渐从散文母体中脱胎而出，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不再沿袭过去的做法，把杂文视为

散文的一支，而是用专门的章节论述这一文体的蓬勃发展和创作成就。

鉴于鲁迅在中国杂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他的卓越成就，研究杂文理论，尤其是研究鲁迅杂文特色的人逐渐增多，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瞿秋白。他在所编《鲁迅杂感选集》的序言中说：

“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并且预言：“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鲁迅的杂文大都谈社会问题，很有文艺色彩，所以瞿秋白论述十分中肯。鲁迅把他视为知己，曾用不同的词句表达了相同的意思：“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内容也还和先前一样，批评些社会的现象，尤其是文坛的情形。”（《准风月谈》后记）他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称之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确有见地。但是，不少文艺和新闻理论著作把瞿秋白关于鲁迅杂文的这段论述，移用为杂文的定义，那就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且举几个例子：

①“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文，它既有政论的性质，又有着文艺的特点。”（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4年10月版）

②“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就其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文艺性和议论性文体的杂交品。”（李庚辰：《杂文写作琐谈》，长征出版社，1982年7月版）

③“杂文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兼有政论和文艺两种因素。”（欧阳周主编：《大学实用写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5月版）

④“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是一种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

变的文艺性政论。”（丁法章：《新闻评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⑤ “杂文小品是为了革命的战斗的需要，对现实生活有所歌颂、有所讽刺、有所评论，采用更直接、更迅速的方法反映日常事变的文艺性的论文。”（吴调公：《文学分类的基本知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2年5月版）

⑥ “现在，杂文的概念已趋于一致，那就是指文艺性的政论文。”（刘孟宇、诸孝正主编：《写作大要》，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六家之言，显然都以瞿说为立论根据。我们不能说瞿论欠当，因为他的“序言”专就鲁迅杂文而发，非常中肯，我们也不可认为六家之言毫无足取，鲁迅杂文当然具备杂文的共性，六家之言也必然触及杂文的一些特征，如文艺性的政论确实已发展成为杂文的主流。但我们必须指出，把瞿说扩大，作为杂文的定义，必然以偏概全，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其一，谈论社会问题的小品并非全是杂文，反之，不谈社会问题的，也可能是杂文。有些随笔札记和饶有文采的小品，谈论花鸟鱼虫、山水草木等方面的知识，没有涉及或只略为点到社会问题，我们不应把这些“没娘的孩子”摈弃在杂文门外，使它们“无家可归”。如果把圈子局限在“政论”、“社会论文”的范围内，必然大大缩小杂文应当涉及的生活领域。其二，“文艺性的论文”，虽然其中有些归属于杂文，但并非都是杂文。尽管不少文学评论写得斐然成章，富于感情，很有“文艺性”，但是谁也不会说它们是杂文。

那么，杂文究竟是怎样一种文体呢？我认为，对这个问题很难一言说明。我们既要看到它与散文的历史关系：它曾经是散文的一支，主要指那些以议论为主的散文小品；又要看到它在“五四”以后的发展方向，更接近现实生活，战斗性强，常常谈论各种社会问题；体裁形式也更加繁杂，随笔、书信、史评、政论、

序跋、文论、杂感等等，凡以议论为主的文学小品，均可归属杂文。如果一定要给它下个“定义”，那便是：杂文是以议论为主，熔叙事、抒情、说理于一炉的文学小品。它的特点，可用“杂”、“文”、“小”三个字来概括。

“杂”，指内容杂，形式也杂。虽然多谈社会问题，其他事物也可取为题材。天上地下，古今中外，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不可谈，兼收并蓄，包罗万象。杂文形式也日益繁杂，凡明显区别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者，只要以议论为主，有文艺性，均可归入杂文大类。

“文”，指文艺性。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与一般议论文不同，不是直接阐明某种抽象道理，常借助文学手法，迂回曲折但生动形象地说理，让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这种说理的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寓理于事件之中，寓理于感情之中，寓理于形象之中。就文采来说，它比一般议论文要丰富，常使用各种修辞手段。

“小”，指篇幅短，是小品。不少人说它是“千字文”，有些甚至比千字还少，当然也有长一些的，但一般很少超过两千字。既然“小”，文字必须精雕细刻，简洁凝炼，字唯期少，意则期多，每个字、每句话都要有分量，起作用，不能落空。

第二章 刘勰心目中的杂文

南朝人刘勰所撰《文心雕龙》，是我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学论著。全书五十篇，其中《杂文》篇是我国古籍中首先提及并讨论杂文的篇章。今人研究杂文概念和源流演变，往往提及此篇，然而几乎众口一词，认为刘勰所谈的杂文与今日所谓杂文“完全不同”，因而抹煞了这篇作品的现实意义。其实，只要仔细认真地读一读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现，刘勰所论确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刘勰把杂文分为三大类：

一为对问体。他认为宋玉“始造对问”。此类文章的特点是：①“申其（作者的）志”，常常借托古人古事，“发愤以表志”，说理清楚，雄辩有力。要求作者身遭挫折，也无所畏惧，靠公道正义战胜邪恶；倘若时势艰难，作者的心情仍然要静如潭水，定若山峙，决不动摇。单纯说理不免枯燥乏味沉重，容易引起疲劳厌烦，所以刘勰进而主张应“杂以谐谑”，在谈笑之中讲真理，给人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②“情见而采蔚”。说理不能冷冰冰，应理中有情，情理交融，热气腾腾。不但要有情，而且应“采蔚”，“麟凤其采”，象五彩缤纷的鲜花。他既反对“辞高而理疏”，又反对“意荣而文悴”，认为文章既要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又要富文采，有表达能力，有完美形式。如果文辞憔悴，苍白无力，势必无所取裁。

二为“七体”。刘勰认为枚乘“首制《七发》”，是“七体”的创始者。他肯定枚乘的《七发》，认为确实“独拔而伟丽”，但

也同时指出“七体”的弊害：①讽一劝百。枚乘在《七发》中叙述吴客为楚太子治病的经过，两人七问七答，吴客用音乐、饮食、车马、宫苑、田猎、观涛六事想打动楚太子的心，使他振作起来，都无效。第七次，他以“要言妙道”启发楚太子，竟使太子大汗一场，霍然病愈。枚乘描写前六件事十分细腻，铺张富丽，淋漓尽致，但他毕竟还指出腐朽生活的弊害，劝人归入正道。后来的模仿者，都以此为模式，通过七次问答，尤其是最后一次关键性的问答，“劝导”、“启发”对方。由于此类文章都“始邪末正”，前六次大讲淫侈，最后才匆匆归入正道，所以正不敌邪，引诱与规劝的力量是百一之比，虽想“戒膏粱之子”，却难以使人迷途知返。②“腴辞云构”。辞藻繁富，象密云堆聚。前六次问答大讲淫侈，作者竭力铺张，层层展开，精细刻划，富丽堂皇，“穷瑰奇之服馔，极蛊媚之声色”，高谈阔论，大讲特讲，可惜都无补于世道人心，

三为连珠体。刘勰认为扬雄“肇为连珠”。这类文章的特点是：①“文小易周”。都是“碎文琐语”串连而成，篇幅短小，正因为短小，作者容易掌握周到，思虑成熟，说理充分，达到“义明而词净”的目的。②“磊磊自转”，虽是无韵文，由于作者精工制作，节奏明快，音调和谐，读起来朗朗上口，好象灵活自如、圆润滚转的明珠。

此外，刘勰还提及典、诰、誓、问、览、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讽、谣、咏十六种文体，认为可以归入“杂文之区”，但又说可以“甄别其义”，各自划入其他比较适当的领域研究讨论。他对这十六种东西没有“曲述”，提而不谈，原因是不难想见的。我们这里也不想浪费篇幅，仅就对问体、“七体”、连珠体的各种特点，它们与当代杂文的比较，谈一些看法。

首先，应把“七体”划在杂文圈外。原因不是首创此体的枚乘写得拙劣，而是他根本没有梦想到把《七发》按照今人的杂文

格局撰写。他的《七发》，大事铺张，分条层层叙述，辞藻繁富艳丽，变化多端，可谓匠心独运，堪称“七体”中的上上之作。问题在于他用了过分的铺张手法。铺陈，作为一种写作手段，本来无可非议，但高度精炼凝缩和短小精悍，正是现代杂文的根本特色，它与大事铺陈水火不能相容。杂文针砭时弊，直来直去，一针见血，痛快淋漓，不会象“七体”那样“始邪末正”，兜来转去，拐了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弯，才正面出击，又匆匆收兵，大大削弱了劝戒的作用。铺张无非为了“取美于宏壮”伟丽，七问七答，从七个方面描绘、议论，当然洋洋大观，单就篇幅来看，也不象杂文的格局了。至于后来的仿效者把七问七答作为一种模式，忽视甚至忘了讽谕的根本目的，变本加厉，一味炫耀辞藻，装潢门面，那就简直背离《七发》的原旨，更非枚乘始料所及。这种奴隶式的、徒具形式的模仿，必然把“七体”引入死胡同，导致它的衰落和死亡。

其次谈谈对问体。刘勰认为宋玉“始造对问”，其实是不确切的。早在宋玉之前，屈原已用对问体写作《卜居》、《渔父》；更早一些，《论语》、《孟子》、《庄子》中若干篇章，也曾用对问体表达作者的见解。但刘勰把对问体划入“杂文之区”，确有卓见。一问一答，其优点在于容易围绕中心，抓住要点，对准目标，层层深入剖析，至今仍有不少作者喜用此体写作杂文。此类文章，或借托古人、古事、古代传说，用比喻手法迂回曲折地表达作者的见解；或直接接触及时弊，不畏欺压，不怕挫败，坚定不移，正义在握，理直气壮地“发愤以表志”。写这类文章，要象两个相声演员登场一样，发议论不忘记时时加杂一些滑稽幽默讽刺，让人笑后深思，增强说服力和情趣。对问体也要讲究文采，要“麟凤其采”，但并不一味追求华丽藻饰，而要根据内容需要，凝炼中求色彩，质朴中求典雅，平实中求明快。

一问一答，紧紧抓住中心；借托古人古事；运用比喻手法；